

獨裁者的邏輯

吳葆璋

1999年10月，法國大報《費加羅》（le Figaro）編輯委員會主席阿蘭·佩雷菲特（Alain Peyrefitte）書面採訪即將訪問法國的共產中國元首江澤民，請他就中國，法國和世界問題發表看法。江澤民抓住這個機會，以先聲奪人的手法，佔領國際媒體，用「邪教」二字，為他在半年前開始的暴力鎮壓法輪功的行徑辯解。

中共當局選擇法國出於兩重目的，一是法國多年來，特別是自震驚世界的「人民聖殿」（the peoples temple）事件以來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從行政和司法兩條途徑著手，防止各類邪教在法國氾濫。因此，利用法國這個特殊的歷史環境，在中共當局看來，乃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良機。

二是專訪到訪的外國領導人，是法國各大媒體，為爭

奪市場而極力追求的目標。中共當局對《費加羅》報投其所好，而條件則是專訪必須全文發表。在政界和報界盡出風頭的佩雷菲特自然是唯命是從了。

江澤民到訪的當天，《費加羅》如約，全文照發了專訪。這篇專訪對法國輿論造成強烈的衝擊。一時間，甚至有記者居然不假思索地鸚鵡學舌，也有的噤若寒蟬，對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搜捕、監禁、酷刑、洗腦不敢問津。

上個世紀90年代初，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40多年的統治，致使數千萬無辜的百姓深受其害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受到普遍的質疑。一種提倡「真善忍」價值準則，旨在健身祛病的修煉方法——法輪功，在中國傳統的氣功的基礎上，得到了出人意外但又是情理之中的發展，受到各個階層的民眾普遍的歡迎。對於這種「有百利無一害」的修煉方法，官方媒體也曾歡呼倡導。然而，在很短的時間裡，有億萬人參加的煉功活動，卻受到了中共政治當局另眼看待。

中共建政以來，始終不渝堅持的一條原則，就是不允許有任何與共產黨平行的組織存在；由共產黨自上而下垂直領導一切，被認為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。妝點「人

民政治協商會議」的所謂民主黨派，在它們的黨章中均寫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，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。在「人民代表大會」及至各工青婦一類的群眾團體，工廠、學校、商店、街區、農村，均設立黨組或黨支部，則是中國大陸特色的政治現實。而如今，法輪功的出現，他所倡導的價值準則，與共產主義南轅北轍，但卻受到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億萬民眾的愛戴。有鑒於當年東歐和蘇聯的巨變，中共當局杯弓蛇影，不寒而慄，認定法輪功就是波蘭的團結工會！

這個結論一出，隨之而來的便是瘋狂野蠻的鎮壓；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，又一大批無辜的中國人成了共產主義的受難者。如同歷次的政治運動，全國大搜捕，囚禁、關押、洗腦總是以一場用謊言和謬論織成的大批判為前導。其目的則在於用虛設的罪名，脅迫不明真相的民眾與當局一起從各個層面「消滅」法輪功。

記得是1956年，我開始大學生活的一年。我和很多青年同學一樣，都喜歡籃球運動。大家決定組織一次班級籃球比賽。就在第一場比賽即將開始的時候，一位年紀比我們都要大的同學，突然出現在場上，正顏厲色地對我說：「你們要幹甚麼？」我回答：「賽球呀。」

他說：「賽球？跟黨支部說了嗎？」我答：「這也？……沒有。」他立即以訓斥的口吻命令：「黨支部不知道，解散！」同學們這才知道，那位入學前曾是共產黨幹部的同學，乃是一年級黨支部書記。我也初步領教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。

再過一年，1957年的「反右派」運動開始的信號，則是共產黨機關報《人民日報》的那篇社論：「這是為什麼？」接下來，連篇累牘的大批判文章，硬是捏造了一個又一個所謂「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」的故事。直到20多年後，當我再次遇到一位「右派」同學的時候，大家面面相覷；我問：「你不是右派啦？」他苦笑著回答：「他們又摘了我頭上的帽子。」

1966年開始的所謂「文化大革命」也是以批判一齣歷史劇開場的。紅衛兵佔領了新華社總編室後的一天，我偶爾遇到已經被當作「牛鬼蛇神」揪鬥，在院內「勞改」的社長穆青。我不解地問他：「你怎麼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啦？」他神色恍惚地說：「我？……30年革命不通馬列……」

1989年6月3日晚間，我從巴黎打電話回北京質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？誰是「廣場暴徒」？接電話的人只回

了一句話就把電話掛了：「不用問了，總社已經被軍管了！」每逢重大行動，首先控制輿論部門乃是獨裁政權的慣用手法。

批判法輪功的文宣攻勢是於1996年6月17日由《光明日報》發起的，十幾家報章雜誌奉命跟進。1999年7月23日，中共機關報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社論：「提高認識、看清危害、把握政策、維護穩定」，嚴詞指斥法輪功為「非法組織」，從而吹響了取締鎮壓的號角。於此同時，當局還發動它所控制下的宗教界人士，民間團體乃至學術團體，發表談話，舉行座談會，就一個莫須有的罪名，口誅筆伐，一場空前慘烈的政治運動就此展開了。

中共當局貼在法輪功群體上的標籤不斷變換：「非法組織」、「邪教組織」、「反動敵對組織」、「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」、「反政府組織」、「反動政治組織和政治勢力」和「恐怖主義組織」。這些信口雌黃的宣傳一度也曾使我的一些法國同行們疑惑不已。

我是在1989年北京六四慘案後，告別新華社，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董事會邀請，創建法國對華華語廣播中文部的。前述江澤民訪問法國後不久，北京大使館曾派人約見法廣董事長，談法國對華廣播問題。董事長讓保羅·克律

澤爾（Jean-Paul Cluzel）提出，中文部主任一起見面，北京外交官卻執意不肯。克律澤爾在會晤後笑著對我說：「我接見了一名紅衛兵。」

隨後不久，另外一名北京外交官約我喝咖啡。一見面，他開宗明義：「我現在要同你談的就是法輪功問題；你所領導的華語節目不要再報導法輪功了。」我問他為什麼？他毫不猶豫地說：「那是邪教，我給你帶來了很多材料。」他從桌子底下掏出來一個大口袋，裡面裝滿了各種有關誣蔑法輪功的宣傳材料、小冊子、宣傳畫、錄影帶和光碟。

我明確的告訴他：「邪教是你們的說法，法廣是獨立的媒體，沒有獨立媒體的調查，我們既不能不報導，也不會按照你們的意思去報導法輪功的。」我建議他，既然法輪功問題已經被政治化和國際化了，大陸當局就應該敞開大門，讓國際媒體就法輪功問題作獨立的調查。

也就是在江澤民訪問法國後不久，我們發現在北京使館的網站上，闢有專門針對法輪功的宣教專欄。這種甚至涉及到外交領域的不遺餘力的狂熱，雖然可能矇騙人於一時，但也喚起了人們的警覺和疑慮。

江澤民利用《費加羅》報欺騙法國輿論和民眾，並

沒有阻止法國當局和有識之士探究法輪功真相的努力。法國政府曾於2002年11月發佈政令，成立了直屬總理府的一個旨在「警惕和為反對邪教氾濫而鬥爭」的各部聯席專案組（Mission Interministerielle de Vigilance et de Lutte contre les Derives Sectaires）。它的任務就是「通過其戕害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其他應受到指摘的行為，觀察和分析邪教現象」。這個專案組還負責「協調公權力防範和彈壓各種邪教氾濫的行動」。

然而，迄今法國當局並沒有把法輪功列入其要防範和彈壓的邪教團體名單。每到週末，法輪功學員在巴黎埃菲爾鐵塔前和另外兩處公園公開煉功，至今不斷；天國樂隊多次參加法國當局組織的大型文化活動；在法國國民議會大廈內，法輪功多次舉辦講真相報告會和研討會。

有趣的是，多年來，法輪功學員要求到北京駐法使館前面舉行抗議活動的申請，法國警方總是藉故不予批准。2009年7月，法輪功學員就此向法國司法當局提告法國員警當局（la prefecture de police）。巴黎行政法院（le 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Paris）最終根據緊急訴訟法官的裁定（l'ordonnance du juge des referes），宣佈法輪功勝訴，法國警方敗訴並被判處向法國法輪大法協會賠款1,000歐元。

對於外國人來說，沒有足夠的中國文化傳統知識和對共產中國的認知，的確一時很難瞭解法輪功真相。在中國不同時期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群體中，法輪功修煉者是一個罕見的壓不垮打不散的群體；法輪功是率先發表反抗暴政檄文《九評共產黨》，全面揭示中國共產黨真相的群體，法輪功也是開中國新聞史先河，在鎮壓的低谷，絕地奮起，在境外創辦了《大紀元時報》、《希望之聲廣播電臺》和《新唐人電視臺》等一大批獨立傳媒的群體；法輪功在國際組織和外國法院提告中共領導人，史無前例；近年來創立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宗旨的《神韻》藝術和開展各種文化大賽活動，蜚聲世界。法輪功修煉者正在和其他的共產主義受難者們一道，為使中華民族最終擺脫共產主義造成的苦難，融入民主自由的歷史洪流而奮鬥不息。

我確信，法輪功這個非典型的抗暴群體，首先是他們中間，那些被大浪拋上歷史前臺的修士們，只要心如明鏡，拂拭世俗的塵埃，他們就一定能圓上那人間善良的夢：「蒼生歸正道，江山復清明」。

就在法輪功遭受迫害後不久，一個被稱之為「訪民」的群體竟然成了北京的一道風景線。這些在一黨壟斷的經濟榮景掩蓋下，被貪官污吏欺壓得家破人亡，無處申冤的

民眾，連年不斷冒險湧向北京，希望討得一點公道，結果卻往往是被拒之門外，甚至被關進黑牢。人們擔心的是，他們是否是中國最後一批共產主義受難者？至於當局賜給他們的政治標籤，至今似乎還沒有定論。

那些無視共產主義的罪惡，見死不救，為極權主義辯解，乃至渴望分它一杯羹的翩翩君子們，不知他們是否想到過，那一時的風光會讓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背負千古的罵名呢！

本文開篇提到的那位法國名士阿蘭·佩雷菲特，被認為是一個「陷入周恩來的魅力而不能自拔」的人。中共當局在他死後，在武漢大學校園內破格為他樹立了一尊塑像，供學子們瞻仰。關於他，中國的青年人還能記憶起甚麼呢？除了充當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幫兇，誣蔑一個正在遭受殘酷迫害的中國人群體外，1973年，這位「中國通」曾出版過一本書：《當中國醒來的時候，世界將為之顫抖》，為文化大革命癡癲時期的中國大陸，竭盡張目鼓噪之能事。他身邊的人日後透露說，這本書展示的中國，「實際上就是周恩來所說的中國」。作者認為，有了眾多的人口和雄厚的經濟技術實力，中國就會立足於世界之林。中國人常說「鼎立三足」，佩雷菲特那本書的讀者們

則指出：沒有民主，不揚棄共產獨裁體制，中國的崛起不過是癡人說夢。